

# 文言散文主旨教学亟待深究与拓展

## ——以人教社高中选择性必修下《石钟山记》等为例

王伟龙

(广州大学附属中学, 广东 广州 510006)

**摘要:** 在中学文言教学中,不少经典散文的主旨研判,或固守经典主旨、结论,或遭大量否定而无深论,或仅有人提出零星侧面的疑辨等,这些转逆经典主旨的做法,有得但所得不多或不深,甚至失去了原有的主旨意涵价值。古今治学的传统,核心素养中思维、审美能力的培育,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品的掌握要求,都呼吁中学文言散文主旨教学要试图深究与拓展。

**关键词:** 主旨教学; 深究; 拓展

中学文言文教学中,老庄等诸子散文有曲折深刻、善譬生动的特点,师生躬身谨对;日常考试和训练中,文言人物传记俯拾皆是,常寄寓伦常之道、为臣之理、品格个性等,师生往往耳熟,也觉简单;而教材中的其他文言散文,学习提示、经典教参等早已对它们的主旨提出简洁定论,师生谨遵其理,似乎无可厚非,却容易导致不少师生认为经典篇目的主旨也不过如此,缺乏发展与升华的空间。

古今治学,疑以析之,析而创之的传统不应湮没,核心素养的培育也内含传承之余的思辨、审美发展的要求,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对中华传统优秀篇章十分重视,因而不能忘记对中学文言文主旨教学进行深究与拓展。

### 一、转逆经典主旨的得失

《石钟山记》(以下称《石》)探究石钟山命名原因,作者写出最明显、集中的一个主旨句是:“事不目见耳闻,而臆断其有无,可乎?”这是其自身对游览之事及文本蕴涵的提炼。但后人对《石》主旨的赞扬、研判、声讨一直未辍,其间得失颇引人咀嚼。

#### (一) 失而无得:旨在推翻已有结论

在声讨已存主旨方面,无论主场迎战,还是侧面迂抄,抑或散点暴击,这类声音都是为了驳倒苏轼自抒的中心旨意,往往还带一丝武断或狡黠。

有声讨者质问苏轼曾写过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这般宏大的声音,却否定“水石相搏,声如洪钟”的发音可能、声响大的可能,认为苏轼在“狡辩”;但苏轼考察的明显是音色的特征。有声讨者又认为苏轼开篇就否定郦元之观点,后又肯定郦元的发现,前后自相矛盾;但苏子否定的本就是其言之不详的缺憾,且用“殆”的推测语气指称其发现,而并未否定郦元前往考察这一实际行动。声讨者还声言“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,故莫能知”有“武断”之嫌;这种说法乍看确实抓住了把柄,但苏轼本就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,将不存在明确证据的已知的士大夫情形作为依据,他并不是打算做一个否定历代士大夫的绝对派。有声讨者进一步强论“渔工水师终生奔波于风波江上”,石钟山之名正是此辈人等所赋,也未可知矣!或许最初命之以“石钟山”名的“古之人”确也是古代的渔工水师,但苏子想要说明的是“古之人”之后的渔工水师不能说出石钟山命名的真实原因,不是断定命名者绝非渔工水师。

声讨者们誓留文本一个体无完肤,进而全面否定“事不目见耳闻,而臆断其有无,可乎?”的中心主旨。但他们全盘否定后退出战场,除了留下一地坭圪,更留给读者一脸迷茫。

#### (二) 谨慎有得:批判论证的非严谨性

此类研判尊重和承认前人之智,谨慎、有分寸地提出疑问,

分析批判其行文、文品等,引人思考。

有人承认苏轼“目见耳闻”的经典主旨,但其论证存在难以掩饰的缺憾。研判者从作者的“事不目见耳闻,而臆断其有无,可乎?”反推出苏轼一定认为郦元、李渤中至少有一个人没有“目见耳闻”,这显然不符合事实,自相矛盾。研判者品咂苏轼的“固笑而不信”,认为苏在学术争论中对其他人毫不留情,未免过于恃才傲物,唯我独尊。以石钟山确是以声似钟音命名为前提,有人认为苏轼所秉持的钟声标准是固化的、狭隘的,即只把古籍中周景王、魏庄子所述的钟声当成世间唯一的钟声标准,此地石头的“函胡”“清越”“硃硃”就一定不算钟声、也不似钟声。研判者借此批评苏轼否定李渤等人结论时所持立场的主观、思维也欠严密。

这些研判虽不见有完整的新论、深论,但仍有一定程度上的启发性、闪光点。

#### (三) 得在其小其偏:世情俗理、科学结论

有类研究可从今溯古,他们把研讨的力量全然放在了石钟山命名的具体原因上。

明地理学家罗洪先认为石钟之声乃“中虚外窾”之故外,指出苏轼“未目其麓”而不全识此山真面目,认为“上下两山,皆若钟形”,暗示石钟山有以形命名的可能。曾国藩认为上下石钟岩有洞、深不可穷,形如覆钟;彭玉麟说全山皆空,如钟覆地,以形得名的见解变得掷地有声了。清代胡传钊在《石钟山志序》中说“水石相搏,响若洪钟,其声奋;上锐下广,中空而如钟,其形奇。”一九七九年鞠继武等在《湖口石钟山》一文中也提出“石钟山具有钟之形与钟之声”。以形得名说与以声得名说走向结合。今天去石钟山游览的人,除了能乘船一会山体周边的孔穴外,还能去“响石馆”听一曲石头“编钟曲”,体会敲击本地金属元素丰富的石头产生的钟磬妙音。

科学道理似已昭然,命名原因似很全面,千年前的苏轼是否也可以被讥笑为“简陋”了呢?“目见耳闻”的自得之论是否也只能变成“固笑不语”的对象?然而,某个具体的科学原理真的是人文学者的全部哲思归宿?恐其小、忧其偏。

#### (四) 略有深得:巩固深化经典主旨

还有研究者提出《石》的主旨深具哲理性,且正是作者生活经历、政治遭遇的一种折光。

1084年,作者从黄州被量移汝州,四年前的“乌台诗案”阴霾未散,艰辛困顿、忧闷苦涩,岂能淡忘?但乘船省费,亲送长子赴任,筠州将会辙弟,一举三得,宽慰向往,自不必疑。研究者还原了当时完整的情境,顺延判定苏轼矛盾之余更有平畅心境与游览兴致,让我们体会到了他达观的文人形象。遥念熙宁四年起,

苏轼通判杭州，又知密州、徐州，他不但执行新法，且发现和发扬其便民之处，这与他当初不满新法骤然推行、不辨现实的立场相呼应，也与他此后回归朝廷又反对尽废新法的呼吁相一致，都是对坚持据实施策的坚守。这样的坚守不好应和游历探名必求“目见耳闻”的精神吗？研究者让我们发现了作者坚执的士人形象。④“目见耳闻”的经典主旨更显合理、透彻、混融，作者形象也更丰富、真实、正大。

## 二、尊重但不驯服于经典主旨定论

当然，作者的结论，乃至本意，是否就是文本全部的、真正的主旨呢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文本诞生了，其主旨内涵往往就不完全掌控在作者手里了，文本研究角度的更新，又或时代环境的衍变，都可能使得主旨出现增减或异化。何况作者自身的结论（句），可能因思考受限，又或故言其表，不一定完全、真切地表达了本应明确的意旨。

面对“事不目见耳闻”一句，我们一般不会简单地认为“眼睛看到画面、耳朵听到声音方为实”是此文主旨，毕竟“目见耳闻”与“（主观）臆断”是句中明显的反义词，“目见耳闻”在深层上至少应作客观（实践）理解。然而，将主旨内涵定性为实践，足以令苏轼自断唯有古之人与己奉行实践，并既叹（郦）又笑（李）吗？

姑且假设苏轼探得原因为全部的真实原因，我们再从三个维度、七个方面（实地考察与否、探得原因真伪、言说原因的详略无）考察文中人物（类型）的实践高度，可得如下不等式：古之人、余 > 郦元 > 渔工水师 > 李渤、寺僧小童 > 士大夫（笔者认为渔工水师就是舟人，即驾船人）文本语境肯定郦元的实地考察，猜测他大抵也探究到与自己一致的真实原因；渔工水师多有撑船经历，应当眼见耳听其实；李渤主动对比实验，小童也有跟风敲石——这些不同高度的实践不可抹杀，不能全然被指为臆断。所以，即便是顺着作者的文本挖掘出的“客观（实践）”的本意、结论，也难以深层自洽。

经典教材、教参给定的主旨定论当然要合理品析和适度接纳。

《石》的学习提示说道：“文章……始终萦绕着求真辨伪的旨趣……引申出事须‘目见耳闻’、不可臆断的道理……其中体现的质疑和求实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”但编者判定主旨的这段话是较为松散的，提取核心词是“求真辨伪”“质疑求实”，进一步切分层次、调整顺序、合并同类，可为“质疑”“辨伪”“求实/求真”，浓缩一下就是“疑、辨、实”，一个逻辑链条、系统理论只是隐约呈现。且郦元和李渤按理也是经历过疑问、分析、实践几个过程的；苏轼“声论”之后“形论”“声形结合论”的出炉应该都有这番过程。可见，苏轼的探究历程只是前人、今人、后人同类研究中的一次，其事实结论既不是终论定论，其研究精神也不过是一脉相承。因此，笔者为编者揭示此主旨的略嫌含混感到惋惜，也认为其未曾发掘文本此主旨的延展空间实为遗憾。

## 三、基于经典主旨的探究与拓展

文化著作、文学文本，其终极价值指向人文性内涵，得在人文内涵是为大得。要深究苏轼本人的时政处境，要考量他的身世个性，苏轼的“目见耳闻”说，或后人凝结的“实践”说才能自洽的。当时，他对自身遭际之痛有隐忍抒发之需，对朝廷变法有冷静看待、客观评价、据效实施的坚持，对长子赴任有殷切教诲之心。“目见耳闻”是为实地考察、实事求是，借物名抒事理，不搞主观臆断，更不唯己妄言，要追求理论之真，更躬亲于事，长子、自己、天下士大夫都当如此。作者的重点不是在强调他人实践的有无，而是在比较大家达到的实践高度：能入其正途、再

得其真理、更言之成文、进而惠诸于众，这才是士人追求的名实相符的真意所在。当然，少一个环节，便第一层境界，能否一直秉持“目见耳闻/实践”的精神，必然是一个关键，也是一个基础。

教材编者所说的主旨在层次上有拓展，但若系统明言其层次，乃至升华认识到它的历史循环性，则思辨性、启发性更强。“疑、辨、实”是教材编者对苏轼游览所得的综合考辨，当其变成“疑-辨-实”的连锁关系后，我们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思维逻辑闭环。而且，在前世当时后世，在万事万物万情上，这个过程都是在不断循环升华的。

是否还有其他值得探讨的主旨研究角度和内容呢？

笔者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角度。作者感喟“古之人不余欺也”，语气语意中，古之人命名石钟山应非偶然，其实践，其理得，皆如苏子。那么之后的舟人、士大夫、郦元、李渤、寺僧等等，都没有传承到命名的真实原因，也没有得到名重实察的传统，直到苏轼自认为拾起了这个传统，进而重新发现了真相。饱受不察察而臆断的官员们“带”给他的苦，苏轼痛感当世士大夫已丧失秉实言行、名实相符的传统，仕途风雨又在另一个层面上与游览经历所得相合。所以，作者隐含的感发可能是对传统丧失、传承中断的感喟，这也确实算得上是文本的一种补充性主旨。

不唯前人、不唯传言、不唯权威，重视实察、有所发现、循进不止，最终更接近事物本质，这是笔者对《石》之主旨深挖后的所得，甚至可以再由智者拓展。

又例如，就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一文进行简单的深挖。文本本意在通过郭橐驼对种树方法的陈述，说明“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是“养树”的关键，指出为官治民不能“好烦其令”，针砭中唐吏治的扰民、伤民的情形，悟出“养人”也必须“顺性”的为官之理，体现“养民”才能治国的思想。但我们是否也可以多问几句：郭氏种树的道理不是挺简单吗，长安真的只有他懂？官员养人之术不是也很寻常吗，官场竟少人实施？！那文本主旨是重在揭示“养人”之理，还是批判昭昭之理竟然未被推广，而改革弊政确属迫在眉睫？文本揭示治国的具体道理和改革弊政的迫切愿望，孰轻孰重？如果我们再深挖其他文言散文呢？

中学文言文主旨教学的研判不容易，也不容草率，诚然如斯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曹瑛.《石钟山记》新辨[J].现代语文(教学研究版), 2008.
- [2] 张志琦.《石钟山记》质疑[J].语文教学与研究, 1997.
- [3] 周陶富.《石钟山记》“缺疑”[J].中学语文教学, 2014.
- [4] 聂鸿飞.《石钟山记》的思想及艺术价值[J].文史知识, 1993.
- [5] 萧德君.《石钟山记》疑析[J].四川师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198.
- [6] 温儒敏等.人教社高中选择性必修下册[M].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20.

本文系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课题一般课题“指向高阶思维培养的高中语文‘实用性阅读与交流’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实践探究”，课题编号为202214232的成果。

作者简介：王伟龙，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。曾获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等。